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方世南教授

主持人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战略任务,并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栏目五篇论文予以解读。方世南教授的《从四个共同体维度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深厚哲理》,从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价值同构的利益共同体、共存共荣的安全共同体、互馈互益的发展共同体这四个紧密关联、相互作用的共同体维度,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蕴含的深厚哲理。曹峰旗教授的《生态文明新形态三种理论资源的梳理与阐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生态文明新形态”最重要与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生态文明新形态”根植的文化基础,认为西方生态思潮对“生态文明新形态”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曾德贤副教授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生态健康与人民健康辩证互动理念研究》阐释出生态健康与人民健康辩证互动理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制度为保障、以整体性为共识、以永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取向的观点。陆波副教授的《新时代长江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价值和路径》,阐述了长江生态文化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诉求、价值导向和价值远景,分析了大力弘扬和建设长江生态文化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韩雪梅博士等人的《基于生态与经济耦合的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协同治理研究》以重庆、宜昌、恩施、神农架四个地区2009-2019年的生态经济数据为例,分析了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中四个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关系,找出了影响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生态与经济耦合关系的因素。

从四个共同体维度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深厚哲理

方世南^{1,2}

(1. 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2. 苏州大学 东吴智库, 江苏 苏州 215006)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念,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要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层面上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一个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重大哲学命题,充满了丰富的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的价值与生态价值的辩证关系、人的生命安全与自然界生态安全的辩证关系、人的生命存在与发展与自然界生态存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等多方面必须予以正确把握的辩证关系。在人类社会有机体系统与自然生态有机体系统互渗互融所构成的共同体场域中,应从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价值同构的利益共同体、人与自然是共存共荣的安全共同体、人与自然是互馈互益的发展共同体这四个紧密关联、相互作用的共同体维度全面地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蕴含的深厚哲理,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中行稳致远。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X 321; D 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19(2023)03-0001-06

收稿日期: 2023-02-18

基金项目: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委托项目、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重大意义、理论创新研究”(22ZXWD005);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团队项目“长江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 方世南,男,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了全面而系统的科学阐述,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策意识提出了“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50}的总体性要求,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战略定位,部署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参与全球生态合作治理等一系列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我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美好地球家园建设指明了方向。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要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上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一个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重大哲学命题,蕴含了丰富多样的辩证关系。应从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价值同构的利益共同体、人与自然是共存共荣的安全共同体、人与自然是互馈互益的发展共同体这四个紧密关联、相互作用的人类的维度全面地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蕴涵的深厚哲理,坚定不移地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一、从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维度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深厚哲理

从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的维度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深厚哲理,充分认识自然作为生命之母以及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价值,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高度注重人与自然关系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格局的形成,为在全社会牢固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思想共识奠定坚实基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首先体现为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的关系。共同体理念作为一个表征自然界有机系统、人类社会有机系统的基本特征以及两者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共存共益共荣的概念,反映了由自然界、社会和人所构成的有机系统之间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并广泛地运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乃至网络空间等诸多领域。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等思想家曾以“城邦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概念分析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从人具有公共性、社会性、平等性、互动性等类属性和类特征出发,揭示了人类尽管有着种族、性别、信仰等诸多差别,但是,人类都有着在由社会普遍联系之网所构成的共同体中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特性,共同体概念就是用来反映人类普遍性本质以及具有共同性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等基本特性的重要概念。

在生态环境对人类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共同体概念又成为人们分析社会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有着关联性、互动性、互馈性、互益性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在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一书中从大地伦理观出发,提出了生物共同体理论。他强调人类是由自然和人所构成的生物共同体中的一员,要以是否有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2]的行为标准作为判断人类实践活动对错的道德标准,要将注重人伦关系的伦理道德与道德关怀进一步拓展到与人类发生对象性关系的自然上,要通过呵护自然促进生态系统整体趋向稳定、和谐和美丽状态,进而达到促进人类社会和谐稳定美丽的目的。受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影响,被誉为“环境伦理之父”的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观点出发,将自然界(包括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将文化和生活在文化之中的人当作一个与自然发生紧密关系的作为生物共同体成员的人予以认识。随着西方现代化引发的人与自然关系出现越来越紧张的态势,人地矛盾、人水矛盾、人草矛盾、人沙矛盾、人林矛盾、人气(空气污染)矛盾越来越激化,世界环境保护主义思潮和运动风起云涌,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潮和流派也不断增多,对于促进人们更加关注人与自然关系、更加注重生态环境问题、更加注重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永续发展,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其实,关于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的见解,在马克思那里就有较为系统完备的阐述,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点就表达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和谐”^[3]的思想,明确地表达了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的深厚哲理。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因为,人与自然和谐在人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马克

思看来,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之产物,任何人都必须依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类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来源,自然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自然条件。在人与自然结成的生命共同体中,人与自然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人类如果善待自然,就会获得自然的慷慨馈赠,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4]。人类之所以要对自然采取敬畏、尊重、顺应和保护的态度,也是为了能够实现人类自身利益和促进世代永续发展。人类对自然充满恶意,恣意地破坏自然和掠夺自然资源,既是对自然犯罪,也是对人类自己犯罪。之所以出现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匮乏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等,敌人并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自己。自然界从来没有得罪过人类,而人类却总是以各种方式得罪自然界,从而在自然界的猛烈报复中自遭其罪,这是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共生的重要理由和主要目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要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5]50} 在2021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又向国际社会倡议要携手合作,大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要坚持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价值定位,要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49-50}。鉴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推动人与自然这个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迸发出更加旺盛的生机活力。

二、从人与自然是价值同构的利益共同体维度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深厚哲理

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也是人与自然相互创造价值的利益共同体。人与自然作为相互创造价值的利益共同体,又赋予人与自然这个生命共同体以重大的生存和发展意义。在人类的认识领域和实践活动领域,价值既反映人们的利益诉求和利益目标,还决定着人们的利益实现方式。在自然-社会-人所组

成的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一体化的时空中,生态环境价值是人的价值得以实现和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价值,是人与自然之间在价值同构进程中促进双向利益的互利互惠上体现出来的,表现出人与自然是价值同构的利益共同体。鉴于价值问题的抽象性和利益问题的复杂性,澄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价值误区和利益误区,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从人与自然是价值同构的利益共同体维度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深厚哲理。

长期以来,有许多人望文生义、一知半解和断章取义地理解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句话作为关于价值的定义:“‘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6]406},由此将价值定义为是反映人和事物之间的需要和满足关系的概念,即是说,凡是能满足人们需要和有用的就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是无价值的。这是在价值问题上的一个重大认识误区。人们引用的这句关于价值的话根本不是马克思的话,而是那个被马克思称为“学究教授”的瓦格纳的话。瓦格纳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从人是自然生物和有自然愿望出发,把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财物或外界物,通过估价被赋予价值^{[6]404}。针对瓦格纳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抽象地谈论人,特别是离开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抽象地谈论人对财物或外界物的需要,是根本错误的^{[6]404}。马克思认为,要认识与人发生对象性关系的外界自然的价值,就应当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看作理论关系,而应看作是实践关系,而瓦格纳恰恰相反,他将人和自然的关系只是看作理论关系^{[6]405}。马克思说:“如果说,人们不仅在实践中把这类物当做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而且在观念上和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满足’自己需要的物,从而也是‘满足’自己本身的物……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那就证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而价值的其他一切形态,如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只不过是这个概念的属概念。”^{[6]406} 马克思说:“所有这一切同‘价值’这个经济范畴毫无共同之点,就像同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原子论)或化学的当量或同价(化学元素的化合量)毫无共同之点一样。”^{[6]417} 由此可见,将马克思所批判的“‘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硬加到马克思头上,并得出价值就是人和事物之间的需要和满足关系的价值定义,这是何等的错误。

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生命共同体中,人的价值和自然的生态环境价值是双向生成和相互补益的同构关系,自然的生态环境价值是人的价值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以资源能源、生态产品等形式不断地转化为人的价值,而在人的价值和人的利益实现中,人只要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和积极创造自然之稳定、和谐、美丽的方式,就能将人的价值和利益不断地转化为自然的生态环境价值和利益,促进自然界在生生不息的发展中哺育人类,人类又在呵护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人与自然组成的共同体中,如果没有人与自然在对象性关系中创造的价值,生态环境价值既没有任何意义,也无从体现出来,反之亦然。因此,尊重和保证生态环境价值,人的价值才能够充分实现,在此基础上人又会在自身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创造生态环境价值,从而不断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利互益性的价值同构关系。只有把握价值是在人和外物(尤其是指自然)的对象性、互利互益性关系中生成的,是“反映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人与客体的事物之间所具有的一种对象性和双向生成性、互益性关系之契合程度的一个范畴”^[7],才能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觉地将人的价值和自然的生态环境价值看作是一种价值同构关系,也才能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同构进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利互益,促进人与自然建立在价值同构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的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是价值同构的利益共同体的理念,习近平明确指出:“人与自然是互利共生的关系”^[8],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因和特点在于人与自然在价值实现方式上有着互利性。互利是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保障,互利是人与自然能否实现价值同构和利益共得的重要手段,互利也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强大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要求从人与自然互利关系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1]23}由此可见,只有将人与自然看作是建立在双向价值同构的互利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将人的价值和生态环境的价值紧密地关联起来,通过绿色发展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着力构建基于人与自然在价值同构关系上实现互利的利益共同体,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的。

三、从人与自然是共存共荣的安全共同体维度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深厚哲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示的是一种安全状态,这种安全状态就是一种从古至今人们都梦寐以求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想安全状态。这种理想安全状态是一个包括了以人的生命安全为底线兼及人类社会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为主要内容的安全和自然界以风调雨顺等方式呈现出来的生态环境安全紧密地融于一体的理想大安全状态。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本质上就是人与自然在共存共荣中形成的安全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人类社会的各种安全以及人的生命安全和自然界生态环境安全在双向生成、双向促进中形成的一种大安全格局,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内容,必须从人与自然是共存共荣的安全共同体维度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深厚哲理。

安全是人类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所都希冀的一种生存和发展免于危险的状态,安全是保障人权和使人们获得自由的根本保障。安全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界定和不同的要求。马克思从政治学、法学的视角指出:“安全就是社会为了保护自己及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而给予他的保障。”^[9]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有机系统中,生态环境安全(或称为生态安全、环境安全,此文统称为生态环境安全)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局限于生态环境领域方面的安全,而是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安全与人类社会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在内的各种安全在共存共荣关系状态下组成的一体化安全,也是一种将生态环境安全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关联起来的总体性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有效地保障人权的实现,发挥着推动人获得自由和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功能。一般而言,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而有助于人类安全生产、安心生活并确保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安全保障程度就是生态环境安全。具体而言,生态环境安全包括人类居住环境、土壤、食品、饮用水、空气、声音等关联人类生态环境权益实现的安全保障程度。在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都处于普遍联系共同体状态下,生态环境安全必然要求人类要以共同体的理念高度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不断地提高有效应对和解决生态风险、生态危机、生态灾难的能力水平,不断提升生态环境系统对人类生存发展、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保障程度。正如美国生态环境安全专家诺曼·迈尔斯所说:“整个国家共同体,而且整个人类,需要享有的安全形式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洁净

的、未受污染的环境、水、食物和稳定的大气与气候等环境物品的提供。简言之,所有的国家都需要一个地球栖息地”^{[10]30}。

生态环境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中处于最为基础性的地位,构成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缺乏生态环境安全这块坚实基础,必然会导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一危局出现。在生态环境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无视生态环境对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传统安全观已经不适合当今形势,必须代之以将作为人类物质生活基础的环境资源引入安全理念的新安全观,因为当今时代,“每一个环境因素可以成为经济混乱、社会紧张和政治对抗的一个根源”^{[10]19},因此,必须高度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而引发的生态环境矛盾,避免生态环境因为不安全而导致的政治不稳定和社会不和谐,甚至由此引发的国际关系紧张和冲突不断等现象发生。

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安全共同体,是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与生存环境资源处于和谐相处状态,是免除了使人类感到损害风险的一种稳定状态,是人与自然能和谐共生最为显性的表现。人类和自然界的双向安全格局是在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安全共同体中获得的,“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11]。在地球一村、人类一命的情况下,安全已经没有任何边界。对于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和病毒大流行,任何个体、群体或单独的民族和国家都无法有效应对,必须依靠全人类组成的不分国别、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意识形态,人人参与、个个出力的共同体的力量才能取得应对成效。因此,既要以安全发展的理念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内安全共同体,又要强化以“类主体”“类责任”“类安全”的理念推动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

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安全和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安全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多次强调我国要大力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并为全球生态环境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指出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5]24} 因此,发展为了安全,安全促进发展,如果发展建立在不安全的基础上,宁可不要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形成和不断发展的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生态环境安全状态下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全球经济社会产生广泛联系的情况下,生态环境安全和人类以生命安全、身心健康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环境权益,是有着全球普适性价值的新型人权。只有大力倡导和努力践行“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安全”和“同一个健康”的全球生态环境

安全和生命安全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新理念,才能在当今这个生态环境风险和人类生命风险一体化爆发的高风险时代确保人类能够共善其身。

四、从人与自然是互馈互益的发展共同体维度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深厚哲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成的生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都不是一种静态不变存在着的共同体,而是在运动、变化中生生不息地生长着的发展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在于人与自然在双向协调、互动、互利的过程中实现双向共同发展。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生”价值诉求,就是人与自然在互馈互益中实现的双向共同发展。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都充分地体现出人与自然是互馈互益的发展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最后都要落脚于人与自然构成的发展共同体状态下,实现人的自由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同时推动自然界呈现出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的可持续发展和永续发展的美好图景。人与自然作为发展共同体,实质上是一个在人与自然互馈互益中不断创造出价值的发展共同体。只有从人与自然是在互馈互益中不断地创造价值的发展共同体维度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深厚哲理,才能纠正传统发展观和传统现代化观的错误,端正发展的价值取向,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现代化观”^[12],寻找到发展的真善美意蕴,走出一条以绿色发展促进人类文明形态不断提升的科学发展、永续发展之路。

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各种关于发展的理论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发展理论“丛林般”生长的生动景象,西方各种发展理论学说竞相问世,出现了注重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注重以快速现代化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发展理论,注重将环境因素纳入发展内涵的经济增长极限论,注重人的发展和人文价值获得的人的现代化发展理论,注重将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资源和人的发展协调起来的综合发展理论,注重将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结合起来考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注重人类自身发展特别是能力增强的人类发展理论,等等。这些关于发展的理论学说异彩纷呈,都有其问世的深刻时代背景,都有着较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策意识,都从不同角度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内容、发展的价值、

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方式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路径选择。由于发展必须基于生态环境,必须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可持续供给的能力,因此,如何看待和协调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关系、如何看待和协调物的价值和人的价值的关系、如何看待和协调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系、如何看待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关系、如何看待民族价值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发展的价值以及能否达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永续性。从人与自然能否达到和谐共生的目的看,发展实际上分为绿色发展和非绿色发展这两大类型和两大方式。有助于推动构建人与自然互馈互益的发展共同体的发展,就是绿色发展,而以牺牲生态环境获得的那种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或者是牺牲下代人的利益获得的代际断裂式的发展就是非绿色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其背景都是因为现代化学、冶炼、汽车等产业的极大发展,导致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不断增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生命安全受伤害事件频频发生。世界八大公害事件是在发展中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和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影响的典型案例,是一种人与自然互害式的发展。随后,由于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加剧、全球温度不断上升引起的气候变化、病毒大流行等生态和生命的一体化危机,演变成为21世纪全人类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遭受重要威胁的全球性危机,成为比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危害还要严重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命的一体化风险。以牺牲生态环境和破坏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为代价的发展,已经完全背离了发展的本真意义,带来的只能是人与自然之间两败俱伤,而且这种单一地将生产力作为衡量发展业绩的发展方式是根本无法持续进行的。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德国思想家乌尔里希·贝克就深刻地指出:“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3]由于“自然-社会-人”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共同体,因此“每一个环境因素可以成为经济混乱、社会紧张和政治对抗的一个根源”^[14]。发展必须追求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产力,而坚决摒弃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非绿色生产力。

实践证明,发展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前提条件,要建立在人与自然是互馈互益的发展共同体的基础上,而这样的发展就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

展哲学。习近平多次强调:“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15]习近平针对经济发展的无限性和生态环境资源的有限性的内在矛盾、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内在矛盾、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在矛盾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欧美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消耗。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16]。坚持绿色发展,就是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价值定位,以绿色发展实现发展观、现代化观、发展方式、现代化方式的重大变革,以绿色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管理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全面绿色转型,坚定不移地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经济社会,坚定不移地走“体现出发展带来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人的价值的统一、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的统一、民族价值和人类价值的统一”^[17]的科学发展、永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奥尔多·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M]. 侯文蕙,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13.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8.
- [4]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1.
- [5]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7] 方世南.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价值意蕴[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 [8]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243.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8-439.
- [10] 诺曼·迈尔斯. 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M]. 王正平,金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30.
- [11] 齐格蒙特·鲍曼. 共同体[M]. 欧阳景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6.
- [1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71.
- [13]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M]. 张文杰,何博闻,译. 北京:译林出版社,2018:3.
- [14] 诺曼·迈尔斯. 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M]. 王正平,金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9.
- [1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07.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3.
- [17] 方世南.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J]. 理论视野,2018(2).

[责任编辑:赵秀丽]

方世南教授简介



方世南，男，江苏省张家港市人。1978年考入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政治教育系，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一直在马列教研室、马列教研部、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政治、生态文明等，为苏州大学首批二级教授、苏州大学首批卓越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苏州市首批优秀哲学社会科学专家，苏州专家咨询团团长，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苏州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等职。

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研究》《时代与文明》《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等专著，发表论文490余篇，其中100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被评为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6年版、2019年版、2022年版），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知名度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其中重点项目3项；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3项；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1项。

获教育部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江苏省政府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两项，多项资政建言、决策咨询报告和调查研究报告被中央领导和省市领导批示和采纳，多次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教育工作者，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2015年度影响力人物”。先后赴英国、美国、德国、奥地利、俄罗斯、加拿大、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讲学和学术交流。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Four Dimensions

FANG Shi-nan

Abstract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hering to and promoting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is taken as a major strategy for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as a major concep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thou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he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is a major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is inundated with certain dialectical relations that require proper understanding, includ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uman values and ecological values, the safety of human life and the safety of ecology, as well as the huma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nd that of the eco-environment. In the community field formed by the mutual penet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organism systems of human society and natural ec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philosophy in the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in four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exactly,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together make a community of life, of interests with same values, of security with coexistence and mutual prosperity, and of development with mutual benefits, so as to promote the stable and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a harmonious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Keywords Xi Jinping's Ecological Thought;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Community; Chinese Modernization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anjiang River Eco-economic Belt

LI Gu-cheng LI Qian-nan FAN Li-xia YE Feng DING Yi-fei

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the new philosophy of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is the basic principle to guide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Hanjiang River Eco-economic Belt (HREB). Based on the 2001-2019 panel statistics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HREB and evaluates the five dimensions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ts comprehensive index with the entropy method. On this basis, the Theil index is used to measure and decompos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HREB. The results suggest: the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HREB is fluctuating but advancing with the middle-lower reaches performing better than the upper reaches; the green and open dimension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HREB are relatively prominent, while that of agricultural coordination, innovation and sharing dimensions is lagging behind; and the overall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HREB is narrowing down and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the main reasons of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Keywords the Hanjiang River Eco-economic Belt;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New Philosophy of Development; Entropy Method; Theil Index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Rural Household Income Structure: Influencing Mechanism and Inclusive Effect

YU Wei-zhen WANG Man-m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data of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the IV-Tobit model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are used for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mpact of